

明清江南望族 与社会经济文化

吴江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前言

1

1	I 明清江南科名与著姓望族
3	一、概述
7	二、区域科举文化研究之一：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其人其事与弹词《玉蜻蜓》禁演的前前后后
16	三、区域科举文化研究之二：清代杭州“七子登科”的横桥许学范家族门祚述略（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的家族之根历史考察）
23	四、江南巍科家族兴衰史钩沉：清初江南昆山徐乾学家族的兴盛与衰落
30	五、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著姓望族述略
55	六、明清时期江东镇、常、苏、太三府一州著姓望族述论
81	七、明清皖南徽州府著姓望族述论
111	八、《明清江南世家望族考录》选辑两则

111	(一)苏州城厢“贵潘”望族
115	(二)江南常熟虞山翁氏望族
121	II 明清江南城镇与社会经济
123	一、概述
125	二、区域城镇兴衰变化研究：论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
150	三、区域特色经济研究：清代上海地区的盐场、盐务与盐业城镇述论
173	四、江南城厢镇个案研究：明清江南重邑芜湖的社会经济与城政建设述略
186	五、江南市镇个案研究之一：锡剧《珍珠塔》故事的产生地 ——江苏吴江同里镇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
196	六、江南市镇个案研究之二：俊彦辈出、群星灿烂的浙东名镇陶家堰明清以来人才述略
209	III 明清江南著名的商人、商帮
211	一、概述
213	二、著名商人籍里研究：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籍里考辨

218	三、杰出豪贾门祚研究：明代中后期位居全国十七家巨富之一的江南豪贾安国及其无锡东乡安镇的安氏家族门祚家世述略
225	四、江南著名商帮研究之一：“钻天洞庭”——明清洞庭商帮述略
233	五、江南著名商帮研究之二：论明清徽商在上海地区的经营活动与历史作用
261	六、宁波商帮个案研究：清代在沪经营沙船业起家的宁波小港李也亭及其李氏世家
277	IV 明清江南社会风尚、社会生活和风俗民情
279	一、明代江南社会风尚探索
313	二、清代江南社会生活和风俗民情浅说
326	附录：历史研究与实地历史考察
334	后记

序 言

汤 纲*

吴仁安教授的新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即将付梓的前夕,我有幸读到书稿的全文。这部全方位论述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专著,视角新颖,方式独特,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是他在多年研究上述问题的深厚学识积累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又一项可喜成果。除了“附录”之外,全书正文计有四部分,作者在对明清江南望族作典型分析和专题研究之后,即以此为切入点,依次研究了江南城镇及其经济问题、江南商人与商帮问题、江南社会风尚与风俗民情问题等这样一些江南社会经济史中的重要问题,而又以望族为主线将它们有机地贯穿起来。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那是很难写出这样一部具有如此广度和深度的学术著作的。

全书第一章题为《明清江南科名与著姓望族》。几年前作者曾出版过一部五十多万字的学术专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上海望族》),陈梧桐、唐力行、韦庆远、叶显恩、山根幸夫(日)、松浦章(日)、李和承(韩)等中外学者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及日本国的《东洋学报》、《东方》杂志和韩国的《明清史研究》等海内外十七家报纸杂志撰文予以高度好评。这部新著第一章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上述《上海望族》的姐妹篇。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

一向是中国社会经济发达而又人文荟萃之地,也是著姓望族集中的地方。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作者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明清江南的望族问题,即一方面对明代长洲申时行和清代的昆山徐乾学、苏州潘世恩、杭州许学范及常熟翁同龢等几家望族作为典型来进行重点研究,或对其身世门祚进行考察、分析,或对其业绩功过进行分析、论说,或对其家族兴衰进行考察、研究;另一方面,作者又选择了明清江南的上海地区,皖南徽州府和江东镇、常、苏、太三府一州的著姓望族分别作面上的专题研究,即对明清江南这三个区域的望族群体的历史概况、群体特点和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论述。通过作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以及本章正文前的“概述”,读者对于明清江南望族的一般情况亦就可以基本了解和掌握。而对于其中一些特殊情况,看了本章有关内容则更会印象深刻。例如,一般而言,望族士大夫凭藉自己的才干与业绩,大都能赢得或大或小的社会名声,但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的大名声却既不是由于他在内阁首辅任上做出了什么伟大的治国业绩,也不是因其所遗存传世的《赐闲堂集》等著作具有什么重大的学术价值,而完全是由于清代乾隆年间产生的一部与他有些瓜葛的弹词《玉蜻蜓》唱红了大江南北所致。

本书正文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虽然它们题目各异、各有侧重,但却均与明清江南望族关系密切。第二章《明清江南城镇与社会经济》。对于明清江南城镇及其社会经济,早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注目,并已作出不少可喜的成果。但本书作者不落窠臼,独辟蹊径,在明清江南选择一个地区(上海地区)、一个邑城(芜湖邑城)、一种地区特色经济(海盐生产)和两个市镇(江苏吴江同里镇、浙江绍兴陶堰镇)为几种典型来做专题研究。人们读了《论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即可掌握明清江南城镇兴衰变迁的一般规律;而从其他几个典型研究中,则可以了解上海地区特色经济海盐生产的历史,了解芜湖邑城的社会经济与城政建设的关系,锡剧《珍珠塔》故事产生地同里镇明清以来的社会经

济与文化风尚,以及江南人才名镇陶堰镇明清以来人才发展概况。尤为重要的是,使人们了解到:城镇的功能除了贸迁场所之外,城镇也是许多望族士大夫的出生地、栖身处或原籍。通过第三章《明清江南著名的商人、商帮》的专题研究,则可使读者了解江南望族与商人、商帮关系之密切,深切认识到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江南地区那种“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的社会真相。读了第四章《明清江南社会风尚、社会生活和风俗民情》,则可使读者认识江南望族对于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深刻影响:“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移其风俗。”总之,本书第一章“望族”乃全书的重心所在,“望族”不仅与“城镇”、“商人”、“风尚”关系密切,而且也是以“望族”为主线将其他诸章有机地贯穿成书。全书文笔流畅而颇具可读性、趣味性,它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文史结合颇佳的学术著作。拜读全书,受益颇多。我与本书作者自1985年在安徽黄山召开的首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会上相识以来,已有多年的友谊,他问序于我,遂将通读书稿后的一些体会略述如上,是为序。

汤纲

2001年2月2日于复旦大学教师宿舍

* 汤纲:1928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副院长,原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明史》等。

前言

我在1984年7月由皖调入上海技术师范学院政教系史学教研室任教之时,即下决心利用上海优越的治学环境来开创本人业余科研的新局面。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将我调回故乡上海工作后的业余科研定位在主要研究以上海为主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著姓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关于“江南”的概念,历来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所说的“江南”的范围,则根据近年来大多数中外学者的一般倾向,大致上是指明清时期江苏省长江以南的应天(清代称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太仓等府州,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府郡以及安徽省的皖南诸府郡。而本人的上述定位,则又主要出于如下两点考虑。其一,由于隋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逐渐发展成为国家财赋基地。明清时期,江南工商业繁荣,经济发达,财赋重出而人文荟萃,明末清初这里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地区。迨至近现代,江南的上海则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全国解放后,江南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金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蓬勃发展,上海又处于龙头的地位,在目前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战略中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作出上述定位,研究明清时期以上海为主的江南社会经济文化,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其二,则是由于它与本人研究历史注重实地历史考察的特点(参阅本书“附录”:拙作《历史研究与实地历史考

察》)相符合。一般而言,上海与江南各地相对来说都要比同国内其他地方较近,这就便于我在从事研究时可亲临历史人物活动或历史事件发生之地进行实地历史考察。至于本书以望族为重点来研究明清江南社会,则是由于望族与江南社会的经济、文化、风尚诸方面均密切相关,只有了解望族才能更好地了解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当我在1984年5月自费去徽州进行为期10天的历史考察旅游,游历了歙县潜口乡的“司谏第”(明朝进士汪善的宅第)、屯溪柏树街东里巷的“程氏三宅”(明朝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居第),1985年6月带领上海技术师范学院政教系学生到大江南北搞社会调查时参观了明末“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辟疆的别业“水绘园”、寻访了位于常熟小东门外白茆镇的“红豆山庄”(钱谦益外家顾氏别业,后为柳如是隐居处)……就强烈地促使我萌生写一部明清江南望族史的念头。只是不久当我将此想法告诉我60年代初负责华东师大历史系时的业师谢天佑教授,谢师指点我:初次治望族史战线不宜过长,是否先搞明清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尔后再不断地扩大战果,逐步扩大到江南各府州县乃至全国。我聆受了谢师的教诲,“沉潜”几年,终于撰写成学术专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一书。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继续研究明清江南望族史。由于篇幅有限,本书仅选择了其中的明代长洲申时行和清代的昆山徐乾学、杭州许学范、苏州潘世恩及常熟翁同龢等几家望族作为重点进行典型研究,又对明清江南的上海地区、皖南徽州府和江东镇常苏太三府一州等三个各有特色的区域的著姓望族的历史概况、群体特点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分别进行专题研究。通过上述点、面结合和解剖麻雀的方法,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和三个有特色区域的著姓望族进行历史考察,可使读者对于明清江南望族的概况有个初步认识。

望族与城镇关系密切,因为城镇除了是贸迁场所这个功能之外,它也是许多望族士大夫的出生地、栖身处或原籍所

在。本人差不多在着力研究江南望族的同时,也对江南地区一些相关城镇展开研究。约在1986年10月左右,本人应当时任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的陈学文先生之邀请,参加了由其负责主编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史研究》一书的三人(陈学文、吴仁安和南京师大历史系的陈忠平)编著小组。为了做好本人承担部分江南市镇的编写工作,不仅走遍了今天上海地区范围内所有明清时代已经建置的市镇,而且也到周庄、同里、浏河、乍浦、盛泽、震泽、乌青、王江泾、塘栖等江浙两省的许多市镇进行实地历史考察。本来在此书写作之初,讲明此书是受中国商业史学会的委托,列入全国商业史研究规划之中,争取在1987年内完稿,而由北京某出版社(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姑隐其名)负责出版。但当我们三人如期完成了此书全稿的写作任务之后,北京某出版社忽然提出我们要编写小组交付一笔资金才予以付梓出版,我们三人无力支付那笔巨额的出版资金,故此书的出版计划就此流产了(尔后,陈学文撰写的那部分书稿因他得到了温州“一位有眼光的企业家”的赞助而得以单独结集出版,陈忠平撰写的那部分书稿则由于他获得了江苏省青年社科基金的赞助也顺利地出版了)。我撰写的部分,虽说没有如愿出版,却由此而喜欢上了江南城镇的研究。本书选择了与江南望族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城镇,分别对明清江南的一个区域(上海地区)、一个邑城(芜湖邑城)、一种区域特色经济(海盐生产)和两个市镇(江苏吴江同里镇和浙江绍兴陶堰镇)等江南城镇的兴衰变迁、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和社会经济与城政建设以及区域特色经济、人才发展等诸方面进行历史考察或专题研究。此外,望族与商人、社会风尚和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关系颇为密切,本书亦分别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人与商帮、社会风尚和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诸方面进行历史考察。

在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中,为了比较真切地了解历史本来面目,笔者曾多次亲临有关望族人物活动的场所进行实地历史考察,诸如寻访了明代曾任户部尚书的王鏊退居苏州滚绣

坊后的王家停船之场所“船场桥”，无锡东乡安镇安氏望族的“天全堂”，明代曾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捐俸修葺的吴县学“明伦堂”（今苏州碑刻博物馆）与报恩寺塔（今苏州北寺塔），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顾炎武的出生地昆山千灯镇，清代康熙近臣徐乾学的藏书楼昆山城内“传是楼”，以及皖南徽州地区的“三槐堂”（明万历丁酉科乡举王经天故宅）、“宝纶阁”（罗氏宗祠后堂）和“棠樾牌坊群”等等。

在进行实地历史考察时，我则以能者为师，虚心地向了解、掌握某种专门知识或情况的人求教，如我到周庄镇考察明初大商人沈万三的籍里问题时，就很虚心地向当时任周庄镇文化站长的庄春地先生和镇上几位中小学文史老师请教有关问题；为了深入了解明清江南一带盛行的“望门婚”问题，则到昆山千灯镇向顾炎武的第十三代裔孙顾凤鸣老先生虚心请教，当时已经年届古稀的顾老先生则以其远祖顾炎武的嗣母王氏为例，为我详细介绍了这种“望门婚”的实际情况等等。

在我学术成长与进步的漫长道路上，曾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指导、扶持与鼎助，他们是：华东师大戴家祥教授、谢天佑教授、夏东元教授和刘学照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张磊研究员和叶显恩教授，南开大学郑克晟教授，安徽师大张海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研究员、栾成显研究员和经济所魏金玉研究员，《历史研究》杂志社宋元强编审、仲伟民副编审，浙江省社科院陈学文研究员，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和汤纲教授，上海师大唐力行教授和苏智良教授，苏州大学刘森教授和余同元教授，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杨国祯教授，原徽州《社会科学》主编刘伯山先生，台湾暨南大学徐泓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吴智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朱国藩博士，日本国东洋文库山根幸夫研究员、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和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朴元燾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范德教授等。他们有的是我负

笈华东师大历史系时的业师,但更多的则是我踏上治学之路后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结识的学界师友,多年来他们对我的鼓励与支持,使我受益无穷,而更促我在学术园地耕耘不止,特此谨致谢忱。

作者吴仁安

2001 年元月 15 日于沪上瑞雪大楼二冷斋

I

明清江南科名与著姓望族



一、概 述

明清时期的江南,不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也是著姓望族比较集中的地方。所谓望族,即颇有声望的缙绅官僚地主阶级家族,其中不少的望族士大夫乃当时的社会精英,“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转移其风俗”(张海珊《聚民论》,载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礼政》),他们的所作所为足可以影响一方乃至全国。因此,要弄清楚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那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江南望族的情况。江南地区一向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财赋重出而又人文荟萃之地,其成就所在,即同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徐有贞、于谦、商辂、吴宽、王鏊、谢迁、顾鼎臣、董其昌、徐光启、申时行、焦竑、王世贞、朱国祚、王锡爵、陈名夏、陈之遴、吕宫、金之俊、宋德宜、徐元文、张玉书、王揆、王昶、蒋廷锡、陈元龙、嵇曾筠、陈世倌、徐本、史貽直、梁诗正、刘纶、于敏中、梁国治、孙士敏、董浩、曹振鏞、潘世恩、彭蕴章、翁心存、徐郙、朱凤标、翁同龢、王文韶、廖寿恒等等望族名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或勤政为民,匡危济世,努力实践“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勤奋求知,讲究科学,关心国计民生,不断探索强国富民之道;或潜心治学,著书立说,以学术传世。例如,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民族英雄于谦(1398—1457,浙江钱塘人),系永乐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他为官清正,特别是面对“土木堡之变”能坚决反对南迁都城,力主奋起抗敌,并针对瓦剌利用明英宗作为要挟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于谦后来虽然死于以明英宗为

首的石亨、曹吉祥等一伙复辟者的屠刀之下,但他作为彪炳史册、光照千古的先贤,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缅怀。又如明代向西方学习科学的先驱徐光启(1562—1633,上海县人),系万历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曾著《农政全书》,强调“富国必以本业”;后又历时三年修成《崇祯历书》,实为我国历法参用西法之始。在清代,常熟籍的翁同龢系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等职,为保守的后党所不容,实属支持康梁变法的维新派。苏州吴县人冯桂芬系道光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所著《校邠庐抗议》实启资产阶级维新派之先河;苏州吴县人洪钧系同治状元,曾出使俄、德、荷、奥诸国,官至兵部左侍郎,他则于元史研究大有贡献;等等。总之,明清江南望族士大夫对于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以上所举于谦、吕宫、徐郙等长长一串望族士大夫名单,实际上仅是明清江南望族之中的极小部分。若要对明清两代江南地区数以百计的著姓望族的身世门祚、家族盛衰及其业绩功过等情况全面介绍、分析研究,那显然绝非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何况它还要留出一定的篇幅探索望族与江南社会经济文化诸问题)所能包容得了。由于篇幅所限,本书采取点、面结合和解剖麻雀的方法来研究江南望族问题,即一方面将明代长洲申时行和清代的昆山徐乾学、杭州许学范、苏州潘世恩及常熟翁同龢等几家望族作为重点来对他们的身世门祚、业绩功过或家族兴衰进行典型分析;另一方面则又选择了明清江南的上海地区和皖南徽州府、江东镇常苏太三府一州的著姓望族作面上的分析研究,即对明清江南这三个各有特色的区域的著姓望族的历史概况、群体特点和社会影响等诸方面进行论述。通过上述点、面结合的历史考察和专题研究,窥一斑知全豹,读者则大致可以掌握关于明清江南望族的如下几点基本情况:

首先,望族一般均与科举入仕有着不解之缘。明清时期,

江南集中了我国多数著名的书院、学堂,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名闻全国,不仅其中的吴地科举考试高中状元者实居全国之冠,其他诸如江苏常州、皖南徽州、浙东绍兴、浙西嘉兴等府郡的科举人才亦往往名列前茅。当时江南各地出现了许多科举佳话,如常州府有所谓“两门元望”、“三凤家声”、“五经三榜”等佳话,杭州府有“七子登科”之类的佳话,徽州府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佳话等等。科举入仕,这是明清江南许多家族跻身望族或维持望族地位的法宝。

其次,明清江南望族以文化型家族居多。如常州杨氏家族,自三国初历经明清两代,“以诗鸣者无虑百数十家”(杨葆彝:《毗陵杨氏诗存序》);无锡秦臻“沉浸家学,覃研考据”(《锡山秦氏文钞》卷九),无锡秦蕙田“少承家学,以经术笃行为江阴杨名时所知”(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卷二十一)。总之,明清江南许多望族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积累,“世以风雅相传”,“素称诗礼之家”。

再次,江南望族具有两重性。他们既有勾结官府、鱼肉乡民的负面影响,诸如明代曾任内阁首辅的华亭徐阶“富于分宜(严嵩),子弟家奴暴横闾里”(清·蔡显《闲渔闲录》卷八)、清代曾为康熙皇帝近臣的昆山徐乾学被乡民控告“屠民诈财”(参阅《昆山县民邵德呈控徐乾学子侄姻亲勾结官宦屠民诈财状》,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等等。但明清江南望族也有热心文教、造福乡梓的积极影响,他们乐善好施,多有救灾、济赈、修路、造桥等义举并协助官府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

第四,望族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物质遗产。他们遗存的皇皇文章业绩,诸如吴宽的《匏翁家藏集》、焦竑《献征录》、潘祖荫《滂嘉斋藏书记》等文集,资料弥足珍贵,均是丰厚的文化遗产。而他们生前所居的宅邸、园林和生前卒后所建的各种牌坊、宗祠等建筑,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例如在皖南,牌坊、宗祠与古民居,合称“徽州三绝”,而它们又

大都与明清徽州望族有关。如今,棠樾牌坊群、呈坎的宝纶阁(罗氏宗祠后堂)、宏村古民居等古建筑,已成为徽州颇为丰富的旅游资源。

如果掌握了上述的四点,那末对于明清江南望族的一般情况亦就有个基本了解。而对于其中的一些特殊情况,看了本书有关内容则更会印象深刻。例如,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的大名声既不是靠他在内阁首辅任上做出颇足称道的治国业绩而赢得,也不是因其遗存的著作《赐闲堂集》四十卷具有什么重大的学术价值,而是由于清代乾隆年间产生的一部与他有些瓜葛的弹词所致。当苏州评弹《玉蜻蜓》唱红大江南北之日,亦即“状元宰相”申时行的大名在江浙等地妇孺皆知之时。